

茶陵

一座湘东小城的千年文脉

策划/李卉 张玉成 执行/郭亮 黄婷婷 李翰 张媛



扫描二维码,跟着李东阳诗作深度游茶陵。

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:郭亮 美术编辑:王莹 校对:肖静
2022年9月14日 星期三 28823906

茶陵县城东郊,洙、茶两水交汇处,河畔一块高地之上,耸立着一座七级方、粉红色石砌成的古塔,便是有着“云州一柱”之称的笔支塔,因与城关东门隔江相望,故又有东门塔之称。

据茶陵本土文史研究人员段立新考证,当日李东阳返乡祭祖,即在云阳山下的洙水码头上船,悠悠行至此处,而后拐至茶水,沿纵横交错河道逆流而上,直达碧溪中洲的祖居。当然,彼时的李东阳还看不到如今这座雄壮古拙的笔支塔,要等到200多年后的清嘉庆八年(1803年)才由时任知州高上桂倡议士民捐建,一则是有助风水,二则嘛,旧时此处险滩暗礁颇多,于行船颇多不便,塔亦作航标之用。只是现今航运萎缩,一泓碧水之上,再难现往日樯帆林立的壮观景象,更兼连日晴热无雨,水量大减,行船亦属天方夜谭之举。好在路网交通发达,即连乡间亦是平直的柏油路四通八达,车行不过半个多小时,便到了当日李东阳一行的目的地——碧溪中洲,现行政归属茶陵县高坑镇龙匣村,村前称龙架村,因李东阳诗“我家龙匣水,滚滚入南溪”而更其名。

车停龙匣,一幢红白相间的古式牌楼跃然于前,上镌“相国第”三字,左右镌对联“乡神童一代儒宗诗领茶派韵馨古今贤相四朝史政智纾时艰功昭竹帛”,并镌李东阳《茶陵竹枝词》数首点缀其间。当然,牌楼是近些年修的,最早的牌楼建于明正德年间,迭有翻建,据传旧时达官贵人骑马坐轿来此,必下马落轿步行而入方算恭敬,即便到了今日,当地村民仍有这样的习俗:娶新妇进门,得先进牌坊门,再进自家门;人老百年,灵柩也得先从牌坊下通过,再抬往祖坟地……显然对李东阳这位生长于异乡的族中先贤表达了足够的尊崇。

距李东阳当日返乡扫墓已经过去了500多年,曾有的遗迹都消散在无情的时光淘换之下,但也不是全无踪迹。据说李氏族人至今珍藏着当年李东阳祭祖时手书“我家龙匣水,滚滚入南溪”的条幅,以及当年明皇室敕封李东阳之妻的诰命诏书,并有李东阳自编《怀麓堂集》清嘉庆年间的雕版400余块,同行的当地朋友说能联系到收藏这些“宝贝”的李氏族人,电话打了一圈儿,却未在村中,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寻访者,也只能徒呼奈何了。

茶陵诗派

告别那方镌有“相国第”的牌楼,车行在平坦的村道之上,两边是平整而阔大的荷园,车窗摇下,热浪袭来的同时,亦有浓郁荷花清香。

龙匣四面环山,中间是条形盆地,发源于皇穹仙的零水自东南向穿村而过,当地人称南溪,境内数百亩良田丰收全靠此水灌溉之功,如今为配合乡村旅游,大多改种荷花,绵延一片,煞是壮观。

起先我以为改种荷花是为了因应荷木坪之地名——荷木坪为李氏先祖墓堂所在地,李东阳有《荷木坪二十韵》一诗述昔日扫墓祭祖事——后面查资料方知,荷木坪之荷木与荷花并无关联,所指乃是一种常绿大乔木,民间俗称木艾树,亦称木荷柴,耐火难燃,是很好的防火林种,旧时李氏先祖墓堂之侧遍植此树种,因而得名。按文献所记,现在的荷木坪大抵在去牌坊西北向四五里的山坡之上,只是年久久远,曾有过的坟莹早无踪迹可寻,即连昔日满山遍野的荷木也不知所踪,李东阳诗中所言“燎苻荐馨香,树碑纪名德”的场景自也难寻分毫,徒让后来怀古者惆怅。

在茶陵,尤其是李东阳祖居地高坑龙匣,提到李东阳,多会自家于李东阳“立朝五十年,柄国十八载”的宦海传奇,亦乐于铺陈“巧答泰帝”“智除刘瑾”之类的民间故事,这些故事多出文人笔记,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。李东阳晚年以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当然不假,但其施政取向一直暧昧不明,尤其是正德朝早期,大大监刘瑾把持朝政,同为大学士的刘健、谢迁等相继去职,李东阳亦曾提交过致仕申请,却被年轻的正德帝驳回,不得不依附刘瑾势力而周旋于朝野上下,甚至有给刘瑾理生祠写诰文的传言流出,尽管日后在剪除刘瑾的斗争中不无李东阳的暗中协助,但其附刘瑾的“黑历史”却无法洗清,时人讥为“拌食宰相”也非全无根据,前文所述“相国第”牌坊上所谓“智纾时艰”的说法多少有后人的拔高之意。

除了政治上贵为内阁首辅之外,在治中国文学史者看来,李东阳所开创的“茶陵诗派”无疑影响更为深远。在此之前,文坛上流行“台阁体”,由当时的馆阁文臣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等首创,一味追求所谓的“雍容典雅”,多应制颂圣之作,内容空洞无物,却颇能反映彼时之太平盛世——自“靖难”而后,天下承平日久,颇有盛世之象——为执政者所倡,一时效仿成风,渐成流弊,比之宋时“西昆体”影响更坏。对此卑冗委琐之风,李东阳明确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,得到许多门人弟子及同年、同僚的认同,又兼李位居高位,交游广泛,史载其“每日朝罢,则门生群集其家,皆海内名流,其座上常满,殆无虚日,谈文讲艺,绝不可及势利”,故有后世“茶陵诗派”之谓,文风为之一新,流韵所及,直启之后的“明后七子”的文学主张,乃至日后的公安、竟陵诸派亦多从中汲取文学养分,其功之著,惠及后世多矣。

我非专治文学史者,难以判定李东阳之诗性灵文学主张始于何时,仅从手头所掌握资料来看,至迟在《南行稿》中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——祭祖返乡途中,李东阳将这一路南行所写诗文汇编成集,收诗126首,文5篇,再加序一篇,即为《南行稿》集——尽管集中仍有不少诗文未脱“台阁体”之窠臼,即以前提到的《荷木坪二十韵》为例,本述返乡祭祖事,开篇却是“恭言奉明诏,祭告返乡国”,首言皇恩之浩荡,“政治正确”得可以,继而叙述所见之景物并感怀先祖离家征战之往事,而后言祭祖之实况,“良辰展樽俎,再拜扫榛棘”,紧跟着却又来了句“县令具牲醴,诸生走冠履”,京官返乡,地方官趋附逢迎亦是人之常情,可也没必要写入诗中吧?

相较而言,同样编入集中的《茶陵竹枝词》(十首)则显得清新明快多了。前引“溪南溪北树萦回”句系首篇竹枝词,叙入境茶陵一路所见之景;其二“杨柳深深桑叶新,回家儿女乐芳春。刘羊击豕驱瘟鬼,击鼓焚香赛土神”,叙乡间春社祭灶事,极富民俗学意义,当然,此诗系李东阳听族中父老转述而铺陈成篇,因为李东阳抵茶陵时已是盛夏,自不能目睹春社祭灶之盛;其三“银烛金杯映绮窗,呼儿击鼓鼓肥羊。青衫黄帽插花去,知是东家新妇郎”,叙乡间嫁娶事,击鼓除羊,好不热闹,只是好像现下茶陵不大吃羊肉,倒流行吃狗肉,车行城乡之间,随处可见铁链狗肉的标签,即连政接待室,也常能见到狗肉的身影,也是一大特色奇观;其六“侬饱蒸藜插田,劝郎休上贩茶船。郎在田中暮相见,郎乘船去是何年”,以闺中少妇口吻叙耕田中、妇主中馈的夫妻恩爱之道,且以俏皮、哀怨之言规劝丈夫莫要外出贩茶,不然一去多日不得相见,独守空闺的日子太过难熬——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,向有产茶之传统,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断过一段时期,眼下又续上了,据相关数据统计,茶陵县现有茶叶种植面积6.5万亩,总产量2830吨,涉茶总产值达12亿元,解决就业6000人以上,带动农户增收4000余万元,竹枝词中的妇人若生在今日,当不至于担忧夫君外出贩茶……

类似这样生动而传神的乡村生活画面,在《茶陵竹枝词》(十首)中比比皆是,这一切都让居于京城的李东阳无比新奇,并一一录入诗文中,很难说日后“茶陵诗派”之文学主张与李东阳的这次返乡之行有多大关联,但《茶陵竹枝词》(十首)中清新明快的乡村田园风光无疑是对当时流行之“台阁体”最大的反叛。

“溪南溪北树萦回,洞口桃花几度开。枫子鬼来天作雨,云阳仙去水鸣雷。”大明成化八年(1472年),时任翰林院编修、日后的大明首辅李东阳奉父携弟,南归祖籍茶陵扫墓。一行人从北京出发,走水路沿京杭大运河直达扬州,再由扬州下长江至南京,盘旋数日后,仍下长江,逆流而上,经采石矶、小孤山、蕪州、黄州、武昌诸地而至岳阳,而后沿湘江南下抵省城长沙。在长沙逗留一段时日,改陆路,一路跋涉至茶陵。在赏玩茶陵胜境云阳山后,李东阳写下了入境茶陵以来的第一首诗,而后重整行囊,向离城东北向30

余公里的祖居碧溪中洲(现属高坑镇)继续前行。

此前李东阳从未来过茶陵。百余年前的元末乱世,李氏先祖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四方,编为“戌籍”(兵籍),后戌守京师,故《明史》本传中有“以戌籍居京师”之说,李东阳自己亦言“楚人而燕产”。

尽管自出生起便居于京师,年轻的李东阳对茶陵却并不陌生,父、祖辈代代相因的血脉渊源将自身的来处投射向遥远的罗霄山脉深处,梦里家山近在眼前,又会在李东阳心中荡起怎样的涟漪呢?



暮色下的茶陵古城墙及其下安放南宋铁犀的亭子

书院风流

从满溢荷香的乡间小道蜿蜒前行,拐入B58县道,不过数百米之遥,便可见一幢拱形石门形制的凉亭,石门上镌“学士亭”三字,内里有块刻有“三大学士故里”的石碑,系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时任茶陵知州葆亨倡修,旨在褒扬茶陵“士勤于学”之民风。

“三大学士”者,除前文提到的李东阳之外,还有明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和清协办内閣大学士彭维新,尤奇者在于,“三大学士”祖居都在方圆不足十里的弹丸僻壤之地,尽管因现有行政区划划分,而分属于高坑和秩堂两个乡镇。除此之外,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祖居亦在去此三十余公里的腰陂镇石陂村(其墓至今尚存),在历史上均属广义的茶乡范围之内,茶陵人津津乐道的“一州形胜雄三楚,四相文章冠两朝”中的后句即指此也。

毫无疑问,茶陵虽是僻壤,却有难得的文脉传承,据统计,自唐天复元年(公元901年)至清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4年),共有2名茶陵籍文人中状元,127人高中进士,加上已无法准确统计的举人、贡生、副榜、生员,人数之多,在中国南方十分罕见。以近于“化外”的偏僻小县而有“进士之乡”之美誉,后世学人往往将之归因于茶陵独有的书院文化,南宋之交,北方持续动乱,南方则较为安定,北人纷纷南迁,地要道通,农业发达,社会又较为安定,茶陵,成为一些南迁者理想的客居地。据统计,茶陵69个姓氏,宋、元、明三代迁入的竟有47个。农耕社会,讲究耕读传家,迁入茶陵的各方人氏,为了提高社会地位,便纷纷创办书院,培养自家子弟,以求读书入仕,功名显达。一时间,茶陵书院如雨后春笋,竞相兴起,据《历代茶陵书院》一书统计,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(包括经馆层次的社学、义社)共38所,其中29所续办至清末。茶陵书院数量之多,宋代居湖南第三、元代居第二、清代居首位……

前文所提到“相国第”牌楼之后,如今是乡间寻常可见的砖混结构民居,在李东阳返乡之前,这里曾是享誉茶陵的杜陵书院的所在,据《彦溪李氏族谱》载,书院由南宋绍兴二十七年(1157)进士、南雄司马李时珍之孙李祥淑倡建,时间约在元初,最初只是李氏族中子弟私塾,后渐招收附近乡民子弟入读,李东阳的五世族祖“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”李祁即曾在此就读,致仕后又执掌书院多年。书院后毁于元末兵燹,存世虽仅八十余年,却培育士子百余人,其中进士3人,举人者8人,名噪一时。

只是如今,大多数的书院都如杜陵书院这般消失在时光的无情淘换之下,现今茶陵辖境内还有旧迹可寻的书院只剩秩堂的零江书院——清乾隆时期大学士彭维新即出于此——大革命时期曾被改办为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,培养了段苏权、陈志彬、刘长希、刘宗舜等一批杰出人物,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城区内另有2012年重建落成的涪江书院,明弘治十七年(1504)由时任茶陵知州林廷玉倡建,清初复修,为茶陵规模最大的官办学院,科举废止后改为州(县)立高等小学堂,“民国”年间改为茶陵、安仁、攸县、酃县四县联合乡村简易师范学校,后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办学场所,“文革”时期被毁,重修后的涪江书院为现茶陵一中的一部分,内设茶陵历史文化展厅,展示茶陵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,基本复原了清末涪江书院的建筑形制。



李东阳祖居地高坑镇龙匣村的“相国第”牌楼



重修后的涪江书院正门



72岁的付寿贵,每日都会在茶陵古城墙下为游客义务讲解



嵌有“三大学士故里”石碑的“学士亭”外景

悠悠古城墙

“溪上春流乱石多,郎郎慎勿浪经过。莫道茶陵水清浅,年来平地亦风波。”

在碧溪中洲的祖居,李东阳待了18天,而后启程北返,走水路经江西到浙江,而后在杭州登上京杭大运河的官船,一路直抵京师。在离境茶陵之前,李东阳写下了《茶陵竹枝词》的最后一首,叙茶陵水城风景之壮美,兼叹舟行之艰险。

涑水是茶陵的母亲河,这条自罗霄山脉深处发源的湘江一级支流,流经茶陵全境,哺育一代代茶乡儿女的同时,亦在无数文人墨客的吟咏中满溢诗意。在李东阳返乡之前的半个多世纪,明永乐五年(1407年),有明一代大才子、时为内閣首辅的解缙因事被贬广西布政司参议,上任途中经过茶陵,有《夜泊茶陵》一诗,曰“山绕荒村水绕城,蒹葭芦苇水滩声。秋风浙沥湘江上,人自思乡月自明”,极赞月夜泊舟茶陵城下的美景。只是解缙到底外来过客,偶一驻足,只着眼于迷人的山水美景,不像祖籍茶陵的李东阳,有族中亲友解惑,知道清浅可人的绝美风光之下,亦隐藏着无比凶险——即“年来平地亦风波”之谓也——甚至连茶陵人引以为傲的古城之筑造也险些因水患而中止。

南宋绍兴四年(1231年),茶陵县令刘子迈奉湖南安抚使余嵘之命筑城以抵御郴州、桂阳一带的苗民起义,址即在今茶陵古城墙处,由于该城“东南枕江,水冲荡”,故而“不能城”,传说是涑水中的河妖作祟,刘子迈乃“括铁数千斤,铸为犀,置江岸,以杀水势”,而后“列木石其上,而土其上,城乃成”。当然,河妖作祟之说是无稽之谈,“城乃成”的真正原因却是作为县令的刘子迈深谙建筑学之理——“列木石其上”是指在河岸边修筑一排地打桩,再在一系列木桩间垒砌片石,固其石为河岸,便形成墙基,再“土其上”,也即采夯筑之法来夯筑泥土城墙,自不惧河水冲荡,“城成”也便在情理之中了。不过,也幸亏有河妖作祟之传说,历经800年之激荡岁月,当日筑成的城墙多半已倾圮不存,留存的部分也多为历代续修,早不复当日旧貌,惟有立于城墙下的铁犀仍是宋时旧物,悠悠诉说近800年来的风云变幻。

是的,我到了涑水河边安置铁犀的亭子边,远处是薄雾中偶露峥嵘的巍峨云阳山,而前是奔流不息的清浅涑江水,背后修复复原的南宋古城墙予人以历史的沧桑豪迈之感……铁犀无语,一如多年静默的岁月,全不顾几个调皮的小朋友在其身上爬上爬下。亭中多是歇凉的旅人——溽暑如蒸,室外行走,不多会儿便满身臭汗,学能避暑,兼以河风拂面,正可熨帖烦躁——72岁的付寿贵亦在其间。在茶陵,付寿贵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,自2006年退休后便担当起茶陵古城墙的义务讲解员,为往来游览古城墙的游客义务讲解古城墙以及其下铁犀的种种,十数年寒暑不辍,已成城墙边上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见我们几个明显外地游客打扮的入内,老人急急凑上前来,问我们是否需要讲解,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老人清清嗓子,开始用带茶陵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解说,所叙无非古城墙及其下铁犀之种种,只用语极考究,文白夹杂,多用典故,非一般旅游景点解说词那般平白如话,显经文人藻饰润色过,配合其虽有口音却异常铿锵的语调,犹忆有旧时私塾先生摇头晃脑、抑扬顿挫之诵读风貌。

我想,老者大抵可视为茶陵千年文脉滋养下的一个缩影——虽布衣芒屨,言行举止却自带诗书之风,恰如我初到茶陵县城,路边买水,视线却被马路对面的一家神台店吸引,店门外作展示样品非常罕见的佛具、香炉诸物,而是一块块规制大小不一的木制牌匾,通作长方体,红底金字,正中镌“天地国亲师位”六字,在此后的茶陵之旅中,车行城乡之间,视野掠过幢幢倒置的民居,不经意间总能见到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这块牌匾,有些还特设了一方神龛安放,走南闯北,他处亦可见此神位,不过多是红纸条幅所书,鲜见木制牌匾,更遑论以神龛安放者,即有,其出现频率也不会像茶陵城乡这般稠密,甚而能养活处在县城最为繁华热闹地段的一家神台店……这是儒家子弟恪守的人伦传统,敬畏天地万物自不须提;“国”字此前应为“君”字,现代社会,“君王”之谓已不符历史潮流,爱国则为人所奉行之准则;亦是血缘纽带,慎终追远,莫不赖此;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,乃有历千年而不绝的中国文脉之赓续……

或许,这便是茶陵独具特色的迷人之处。